



《大家论学》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卿希泰论道教

卿希泰◎著

百年国学巅峰论坛珍藏版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大家论学》

卿希泰论道教

卿希泰◎著

『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卿希泰论道教/段渝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8. 1

(书馆考究丛书. 大家论学丛书)

ISBN 978 - 7 - 5439 - 3404 - 7

I. 卿… II. 段… III. ①道教—研究②史学—
研究—中国 IV. Z126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303 号

责任编辑:张 树

特约编辑:吴 迪

卿希泰论道教

主 编 段 渝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4 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3404 - 7

定价: 16.50 元

<http://www.sstlp.com>



弁 言

李学勤*

日前听到《大家论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很快即将付印问世，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确实是很具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作一推荐。

《大家论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见升温的当口诞生的。这几年，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期间，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作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究竟是继承而且创新的前提。

这里我们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尾声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二十年代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又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其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



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二十世纪。比之清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二十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二十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重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论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



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博得欢迎。

这套《大家论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二十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萃，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二十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二十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2007年12月17日

于北京清华园



序

张泽洪

卿希泰教授奉献给学界的这本最新论集，是应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约请而编选的。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大家论学》，旨在编选近百年以来学术大家之精品，得以入选丛书的作者都是各学术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获得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教授、国家“985 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卿希泰教授，是从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重点学科中遴选的享受院士待遇的文科杰出教授，这在中国人文学科领域是极其崇高的荣誉。卿希泰教授以他在道教学领域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和在国际宗教学界的极高声誉，堪称当代道教学研究的一代大家。

作为国际知名的宗教学大家，卿希泰教授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在于：

1. 填补了中国道教史研究的空白，确立了中国道教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自 1980 年以来，卿希泰教授撰写和主编道教学、宗教学著作共 15 种 22 册，约 600 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道教史》（4 卷）、《中国道教思想史纲》（1—2 卷）、《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道教》（4 卷）、《简明中国道教通史》、《中外宗教概论》、《中华道教简史》（台湾版）、《道教文化新典》（合编）等。其中

《中国道教史》(4卷本),是国家规划的重点项目。1983年4月,卿希泰教授在福州召开的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会议上,接受了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的任务。他带领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团队成员,经过12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200万字的《中国道教史》,该书获得第三届国家优秀图书最高奖、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四川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被方立天教授誉为“我国第一部规模最大、篇幅最长、水准最高的道教史,对于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正确认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具有开创先河的功劳,确实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道教史》,确立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有的地位,也奠定了先生道教学泰斗的国际学术地位。

2. 创立了宗教学研究的一流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卿希泰教授1980年创办的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于1983年开始招收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成为宗教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1999年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宗教学重点学科,2003年成为全国宗教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4年成为“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作为中国道教研究的学术奠基人、博士生导师,先生亲自指导的数十位硕士生、博士生,现分布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道教研究的中坚力量。先生开创的宗教学研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为国际学界所瞩目的研究机构。日本著名学者中村璋八先生曾撰文称:“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最高水准的道教研究机构,其所长卿希泰教授《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众多著作,也一样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最高权威,



就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卿希泰教授著作等身，所撰写的 100 余篇道教学论文，曾先后有《道教文化新探》、《乌菟集》、《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研究》结集出版。《大家论学》之《卿希泰论道教》，共选编先生撰写的 11 篇论文，分为道教综论、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道派史研究、道教的政治思想研究、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五个专题。先生既关注道教的历史、思想研究，也注意道教与当代社会关系的探讨，这种古为今用的学术关怀，大致反映先生数十年道教学术研究的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中国学者所研究的道教学的主要问题。先生现在年事已高，但在道教学领域，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地继续探索耕耘，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学习和体悟。



目 录

出版弁言	李学勤 1
序	张泽洪 1
 道教综论	1
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3
道与三清关系刍议	24
道教在巴蜀初探	35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	85
道教文化与世界和平	87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93
 道派史研究	105
全真道在金代的产生及其思想特点	107
南宋时在南方兴起的一个金丹道派	125
——紫阳派的形成及其传系和特点	
 道教思想研究	151
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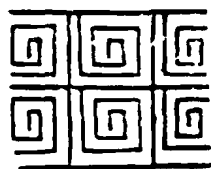


试论《太上洞渊神咒经》的乌托邦思想 及其年代问题	164
-----------------------------------	-----

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73
------------------	-----

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75
---------------------	-----

我和道教文化研究	209
----------------	-----



道教综论



道教文化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互相融合而形成起来的，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他们各自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诸子百家的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有“九流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此作了很好的介绍和总结。在秦汉之际，法家和道家，曾先后一度处于统治的地位。后来，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个儒术已经不是孔子时候的儒术，而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吸收了阴阳家和道家等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便一直是道儒释三教一方面彼此互相对抗、互相斗争，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三教之间的相互对抗、相互斗争是表面的、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则是实质性的、主要的。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能在中国立稳脚跟，就必须中国化。而当时所谓中国化，就是道教化。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太了解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认为黄老道教与佛教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彼此完全是一致的。《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说汉光

武的儿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①。又称汉明帝褒奖他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②《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称襄楷复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③袁宏《汉纪》说：“浮屠，佛也。……其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④因此，当时“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⑤之说，并未引起任何异议。到了两晋以后，特别是宋齐之间，佛教势力发展起来之后，三教之间的斗争，才开始逐渐兴起；到唐代，这种斗争才尖锐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三教之间的相互融合仍然存在。到两宋以后，这种三教相互融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文化学术的发展上占据主流。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道教与儒、释之间既相矛盾和斗争，又相吸取和融合，才推动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必须对道教与儒、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是，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

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偏见，可以把韩愈的道统论作为代表。韩愈在道释二教都很兴盛的唐代，依照道释二教传法

①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5册第1428页。

②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5册第1428页。

③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4册第1082页。

④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5册第1429页。

⑤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4册第1082页。



世系的祖统说，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释二教相对抗，并以维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轲的道统自居，把道释二教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主张对它们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予以彻底的消灭。这是一种极其幼稚而愚蠢的偏见，虽不正确，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至今还束缚着有些人的头脑，不承认道释二家、特别是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极不公正，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方面，都把重点仅仅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侧重儒家，而对道佛二教的研究则很不重视，特别是道教的研究，更是相形见绌，根本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致过去有些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实际上并未全面探讨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其中除儒家的哲学思想之外，既看不到道佛二教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也看不到各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我们这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太相符。特别是我们的道教研究和某些外国相比，还显得很落后，这与我们作为道教文化的故乡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文革”以后，这个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道教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项目，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了研究人才的培养，现在研究队伍也在逐渐形成，并在逐步发展和壮大，一大批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引起了社会的瞩目。于是，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便成为人们强烈关注的问题，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注意到了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对鲁迅先生的这个科学论断在具体理解上虽然尚不完全一致，但它说明了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重